

旅人 吕晓宇

走在异域 写在未来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和我们一起认识一位特别的90后作家,他的人生轨迹或许比大多数同龄人更为复杂一些:

19岁,吕晓宇踏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在高中地理知识的概念里,从东八区来到东一区。

此后的九年,他都在这里度过。

从本科念到博士,获取牛津大学博士;后来供职于联合国,从事冲突协调和国际发展的工作;还曾受邀参加秘鲁总统竞选团队,出版非虚构作品《利马之梦》;最近三年,他的身份则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办公室,吕晓宇接受了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的专访。

他凭借作品《水下之人》获得第十二届春风悦读榜春风新人奖。颁奖当天,他正因北京大学外派

任务前往欧洲参加会议,发来的获奖感言视频中,他提到,“《水下之人》是我第一部发表的小说。这次获得春风新人奖,令我着实感受到意外和惊喜。”

长期行走在异域的经历无疑对这位青年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南极洲,他已经踏足这颗地球上所有有人定居的大洲。有趣的是,尽管在东亚和西欧长期生活,吕晓宇身上却暗藏某种探险家的底色,他对亚非拉以及更广阔的世界充满好奇,并热衷于通过田野实践中的生活采访与那些陌生的、边缘的社会、人群建立联系。

基于丰富的国际视野,吕晓宇的首部小说《水下之人》犹如一首“世界青年狂想曲”,展现了21世纪各国度、各文明青年一代的生存现状,勾勒出混乱时代缝隙中的“水下之人”。

「这本书的创作灵感,一方面我想讨论一些更为宏大的世界发展的主题和趋势,一方面在思考这些趋势对于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交谈中,我才得知,辛劳仅仅是这种异域行走中最不值一提的付出,无法预知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出现:

在吕晓宇办公室的一角,钉着一张不起眼的地图,详细记录着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每处街区。他用手一指,告诉我,自己去年差点被炸死在这里。

在澳洲时,吕晓宇生活的城市突然被森林大火包围,天空从早到晚都是一个颜色——被大火映衬的昏黄色。PM2.5飙到了好几千,那时他想,末日也不过如此了吧。

而在叙利亚的游记中,面对伤痕累累的城市和讲述故事的居民,他这样写道,密集的冲突和危机,过去的100年间贯穿了每一个在沙姆地区的阿拉伯家庭。面前的叙事者是幸运的,活着讲述的人是穿过这些灾难的幸存者。

……

仅仅透过作品,我们当然还不足以窥见这位年轻人穿越国境,行走在各种冲突现场时的全貌。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吕晓宇的对话。

1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曾供职于联合国,国际冲突与和平,一直是您重点的研究方向。丰富的国际行走经历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吕晓宇:对于我个人来说,密集的国际旅行大约是从2017年开始。首先,我的国际经验现在还谈不上丰富,我觉得这只是刚刚起步的状态。但毫无疑问它是新奇、有冒险性的,对我来说吸引力很大。

我的写作被这些国际经验所塑造,但不是有意为之。我并非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很难写下和生活经验缺乏关联的事情,我的写作需要非常切肤的真实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主题,我都会围绕着这些“所谓”的国际经验,因为这是我熟悉且了解的。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曾说过“行走在异域”,一直是您的创作母题。这个创作观是在何时形成的?“异域”“他乡”在您的创作中占据怎么样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些在异域行走的经历,您认为自己还会投身文学创作吗?

吕晓宇:从19岁开始,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的。所以毫无疑问,我创作的母

题只能是围绕着异域的生活或是行走。

比较不同的是,我不想写我真正居住的地方(欧洲),反而是想通过欧洲再出发,前往亚非拉等地方,想去一些和西方、东亚都不太一样的社会去研究和写作。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很多写作会围绕着异域展开。

如果没有这些行走的经验,是否还会写作?我觉得会。

写作对我来说很早就开始了,很小开始写日记。所以写作应该会伴随我的生活,至于是否会从私人写作的领域变成公共写作,很大程度上是要看机遇,不是完全由个人的创作意图决定的。如果生活经验不同,毫无疑问,肯定跟现在的写作风格和主题会很不一样。

潮新闻·钱江晚报:《水下之人》如同一首“世界青年狂想曲”,在历史、文明、国界之间穿插的各色人物,让人不禁想起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您如何理解“世界文学”?哪些作家对您的影响很大?

吕晓宇:“世界文学”的概念,歌德提到过。但我觉得和当下我们所处的语境更为贴切的,应该是石黑一雄对他所认为“世界文学”的定义——现在在世界文学的写作应该使不同区域或不同语言的人进入文本的门槛不是一个鸿沟,读者不需要文化或身份的过多积累去对这个文本进行阅读和理解。

石黑一雄毫无疑问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也多多少少同意他的定义。

事实上,很难说某一个作家对我产生很深的的影响——我对作家的喜好是阶段性的,可以说是一种“海量”的阅读,基本上每半年就会有一个作家进入我的视野,我可能会在这几个月非常狂热地喜欢一个作家,把他所有可以看到的作品和访谈全部拿出来读一遍,过了六个月之后,我又转移到下一个作家身上。

比如,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作家是伯恩哈德(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作家),去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乌格雷西奇(杜布拉茨卡·乌格雷西奇,克罗地亚裔作家)。拉美作家对我影响当然很大,像波拉尼奥,这也是在《水下之人》这个文本的讨论之中,很多人会提到的作家。毫无疑问,无论是中国的当代文学,还是拉美的当代文学,欧美的当代文学,对我的影响都很深。

□本报记者 方涛

